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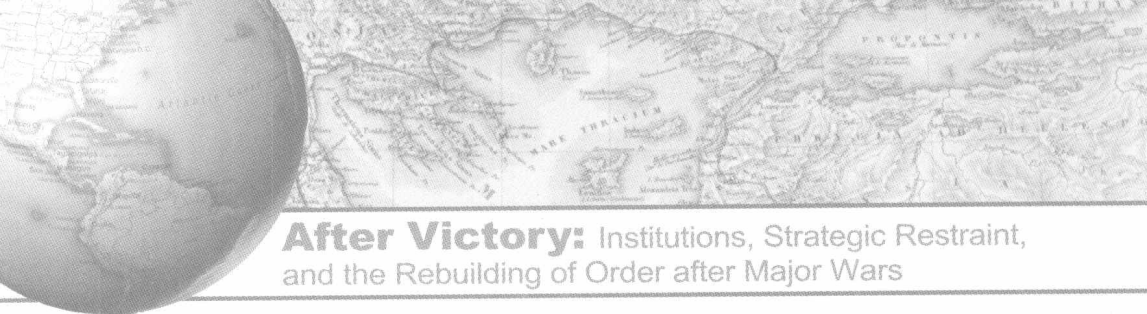
大战胜利之后

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美〕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著
门洪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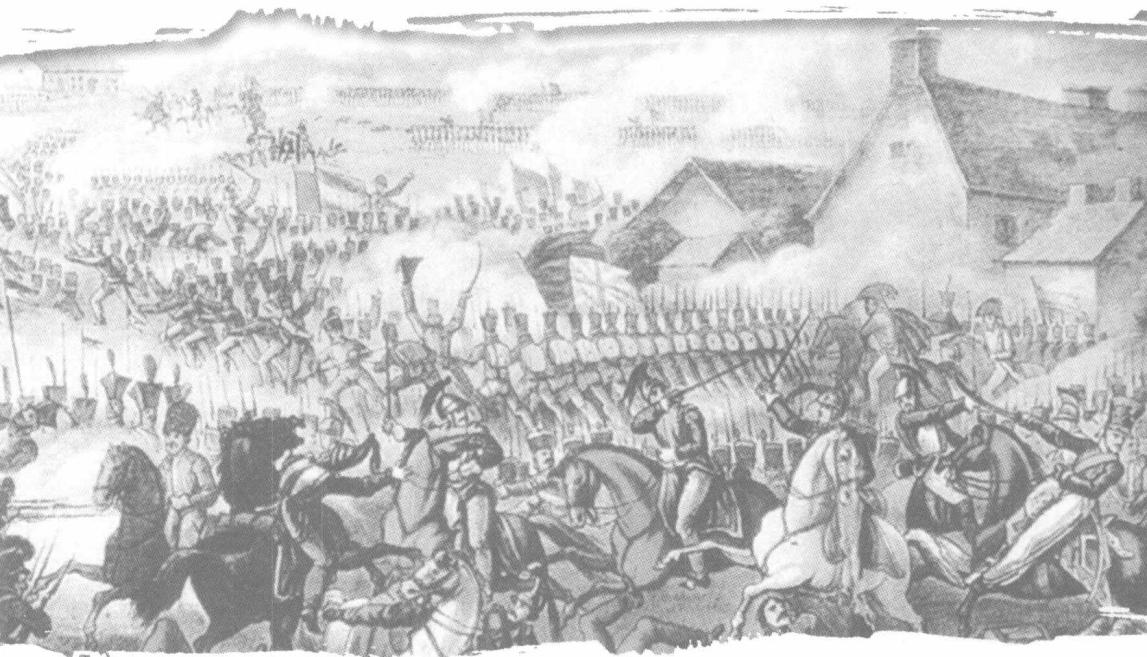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大战胜利之后

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美〕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著

门洪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66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美)伊肯伯里著;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4239-4

I. 大… II. ①伊… ②门… III. ①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近代 ②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现代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1542号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by G. John Ikenberr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1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著作责任者: [美]约翰·伊肯伯里 著 门洪华 译

责任编辑: 徐少燕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239-4/D·21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8.75印张 287千字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约翰·伊肯伯里，生于1954年10月5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伯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政府机构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著有《自由秩序与帝国野心》、《大战胜利之后》、《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合著)、《国家理性：石油政治与美国政府能力》等。

译者简介



门洪华，生于1969年10月4日，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著有《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等。北京大学出版社《大战略研究丛书》主编。

大战略研究丛书·论丛

- 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 门洪华
- 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 郭树勇
- 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苏长和
- 从制度霸权到新帝国：美国大战略的调整 王缉思
- 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 门洪华
- 中国崛起之路 胡鞍钢

大战略研究丛书·译丛

- 美国大战略 [美]罗伯特·阿特
- 大战的起源 [美]戴尔·科普兰
- 帝国的迷思 [美]杰克·斯奈德
-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 [美]约翰·伊肯伯里
-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
-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 [美]约翰·伊肯伯里

·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胡鞍钢

委 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胡鞍钢 G. John Ikenberry

裘援平 王缉思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门洪华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常志霄 陈玉刚 樊吉社 耿协峰

郭树勇 韩召颖 门洪华 苏长和

唐世平 于铁军 Robert S. Ross

本丛书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持

总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象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大战略

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望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

可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译序

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逻辑

国际秩序建构是大国战略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大战之后领导国的战略选择尤其是确立国际秩序的关键。但正如历史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指出的:“国际关系研究对国际秩序如何出现及其变迁关注甚少。关于战后如何处理战败国,唯有少数关于均势理论的文献触及,政治学者将这些问题交给了外交家和历史学家,由他们来评估获胜大国以往如何处理战败国以及将来应该怎样做。”^①鉴于此,2001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堪属填补学科空白之作。本书是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约翰·伊肯伯里的代表作,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并称美国战略研究的两大高峰,也是自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出版以来最重要的国际秩序著作。^②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2002年度最佳国际历史与政策著作杰维斯-施罗德奖(Winner of Robert L. Jervis and Paul W. Schroeder Prize),并成为战略研究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大战胜利之后》以领导国战略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为主题,研究1815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强调领导国战略选择的决定性意义,被视为架起国际关系研究与战略研究的沟通桥梁之作。

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大战胜利之后》一书进行评价:第一,约翰·伊肯伯里其人其文,探究为什么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学术名著;第二,《大战胜利之后》在分析国际秩序建构方面的里程碑地位,评述该书的学术价值;第三,结合伊肯伯里关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Summer 2001, pp. 161—186.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的最新论述,探究《大战胜利之后》对中国秩序战略的启示意义。

约翰·伊肯伯里的学术征程

约翰·伊肯伯里,生于1954年10月5日,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Albert G. Milbank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伊肯伯里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和政府具有广泛的影响,是美国战略研究界中青年一代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他以经历丰富、精力丰沛、成果丰硕著称于战略研究界。

伊肯伯里熟谙美国的“旋转门”制度,长期以来流转于学术界、政策界和政府部门之间,使其研究成果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亦有实践作为背景支撑,其远见卓识由此得以锤炼,诸多实践检验也确保了其研究成果的敏锐和针对性。

伊肯伯里198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伊肯伯里就曾获得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资助,担任1982—1983年度研究员。1984—1992年,伊肯伯里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其中1991—1992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同时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国际事务研究员,兼跨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两界。此后,他全职投入政策研究,1992—1993年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重点研究美欧关系;1992—199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未来委员会高级研究顾问;1993—1994年领导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及其不满”的研究小组从事民主研究,并将其研究视角拓展到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94年,伊肯伯里进入不惑之年,其人生道路选择亦日渐定型,其标志就是自此全职投入学术界。1994—2000年伊肯伯里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2000—2004年执教于乔治敦大学,2004年至今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求建立学术研究、政策分析和政府服务三者之间的桥梁。其间,他1997—2002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1997—1998年获得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助,在国际政策研究所(日本东京)担任日立国际关系研究员;

1998—1999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访问学者；2003—2004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年度顾问团成员。他获得多国、多项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支持。尤其是他获得美日基金会(the U. S. -Japan Foundation)、全球伙伴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Global Partnership)的资助,主持“美日在地区安全和治理上的协作”(United States and Japanese Collabo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多年度项目;获得2002—2004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助,研究跨大西洋关系,为其研究西方国家间合作和美国联盟战略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些经历和学术积淀最终使其迎来了一个影响世界的重大机遇。2004—2006年他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共同主持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组织美国政学研各界四百多位知名人士为美国21世纪的安全战略做出全面规划,普林斯顿项目最后报告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伊肯伯里多年研究和经历的结晶。^③

伊肯伯里的学术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战略起步,多年来把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大战略、国际关系理论、跨大西洋关系、美日关系、西方秩序作为研究核心,最近则逐步将其研究重心转向亚洲,并对中国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他长期致力于杂志和丛书编辑工作,1985—1992年担任《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副主编、主编,目前仍担任编委会成员;1998年至今担任《外交》(*Foreign Affairs*)政法著作的评论人;1999年至今担任《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联合主编;1999年至今担任《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编委;1997年至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国际关系丛书编委;2001年至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历史与国际关系丛书联合主编;2002年至今担任东西方中心东亚丛书编委等。此外,他在世界各地讲学,学术足迹遍及美、欧、亚。根据伊肯伯里自己提供的资料,2002年他在美国发表演讲15次,到日本、韩国、英国、意大利、芬兰、西班牙、中国等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9次,

^③ 关于普林斯顿计划的系列研究成果,参见:<http://www.princeton.edu/~ppns/report.html>。

平均半月发表一次演讲,这还不包括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主持的研讨会、演讲会,其学术影响力和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广泛的研究兴趣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得伊肯伯里能够做到著作等身、重量级学术论文频频见诸学刊。他在美欧所有重要学术期刊上均发表过宏论,在诸多政策性杂志发表见解,还是《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粗略划分,伊肯伯里关于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包括:《美国外交政策理论文集》(*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1988, 主编);《论国家》(*The State*, 1989, 联合主编);《国际关系新思维》(*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7, 联合主编);《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3, 合著);《遭受质疑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 in Question*, 2003, 联合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与亚太》(*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2003, 联合主编)。伊肯伯里关于美国战略的著作包括:《国家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The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88, 联合主编);《国家理性:石油政治与美国政府能力》(*Reasons of State: Oil Politics and the Capacitie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1988);《美国促进民主:动机、战略及其影响》(*U. S.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2000, 联合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2002, 主编);《美国与东北亚》(*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 Old Issues, New Thinking*, 2007);《确定方向:关于美国大战略的争论》(*Finding Our Way: Deb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2008, 合著)。伊肯伯里关于西方关系(含跨大西洋关系和美日关系)的著作包括:《大西洋边疆:美欧关系新议程》(*Atlantic Frontiers: A New Agenda for U. S. -EC Relations*, 1993, 合著);《改造同盟:变革时代的美日安全伙伴关系》(*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2003, 联合主编);《制度功效:美国、日本与东亚治理》(*The Uses of Institutions: The U. S., Japan,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2007, 联合主编)等。伊肯伯里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包括:《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2001);

《自由秩序与帝国野心》(*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2006);《西方的终结:大西洋秩序的危机与变迁》(*The End of the West?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Atlantic Order*, 2008, 合著)等。目前他正在撰写题为《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国体系的起源、危机与转型》的著作,即将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纵观伊肯伯里的学术历程,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其民主制度为探究问题的出发点,美国战略是其研究的重心,而国际秩序是他所关注的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起步开始,伊肯伯里就把国际秩序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学术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国际秩序的探索是分不开的,亦与国际秩序变迁受到重视的全球情势分不开。他在《大战胜利之后》前言中指出:“我对战后重要历史关头及和平安排的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关于美国霸权特征及其意义的探讨如火如荼。我不仅对美国霸权的衰落感兴趣,而且关注霸权秩序如何首创,以及更一般意义上政治秩序如何创立”。这种长期关注的秉持,最终使他成为国际秩序研究上最权威的理论学者。从理论取向上看,伊肯伯里的基本理论核心是自由主义,但他并不像其他自由主义学者一样抵制现实主义的作用,而是结合二者^④,并强调建构主义的价值。^⑤这种理论融合运用体现了战略研究不拘一格的理论视野,可以说,在他身上体现了杰出战略研究者的应有素质。^⑥这样一位学者的理论积淀、战略视野和学术成就足以为学界所看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他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是同时代最富天才的国际关系学者”^⑦。

^④ 他与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格里科的合作堪称经典,参见 Joseph M. Grieco and G. John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⑤ 如下文章可以明确体现出伊肯伯里对建构主义的建设性态度:G. John Ikenberry and Jitsuo Tsuchiyama,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 2002, pp. 69—94。

^⑥ 笔者曾指出,大战略学者(Grand Strategist)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参见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⑦ 参见:<http://www.polity.co.uk/book.asp?ref=9780745636498>。

《大战胜利之后》的学术价值

探究大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战略意义

国际秩序是大国的核心国际战略议题。进入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进程和标志均与国际秩序相关,大国首先崛起于所在地区,并逐步向全球扩展其影响,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均将因此而震动。堪为作证的是,冷战结束前夕,大国领袖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事务(如裁军等),而是国际秩序的走向,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布什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均体现了这一点。^⑧

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换言之,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制度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⑨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因此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必然是巨大

^⑧ 相关分析参见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第328页;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166页。

^⑨ 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3—142页。

的。赫德利·布尔指出,大国之所以能够影响国际秩序,是因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国家实力的不平等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大国也可能采取有助于维持或损害国际秩序的政策。布尔指出,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在整个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自己在国际体系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鉴于此,大国必须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满足世界上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⑩然而,冷战结束已近二十年,国际秩序却依旧处于转型之中,“美国如何管理和平依旧是处于当代国际政治核心的首要问题”,而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际上开改造国际秩序之先河,导致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⑪

理解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历史经验教训的回溯。在这个意义上,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理论和政策研究具有开创性,通过《大战胜利之后》及随后进一步的探究,伊肯伯里就上述问题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

《大战胜利之后》的主要内容

《大战胜利之后》的主题是,探究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即赢得胜利的主导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建立国际秩序。以此为核心,本书确定将领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伊肯伯里认为,寻求这一问题之答案的最佳途径是研究战后情势,因为各领导国均力图克服关于秩序建构的基本难题。其中关涉三个核心问题:面对历史关头,新兴大国进行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国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如何解释工业化民主国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后所体现出来的稳固性?以此为线索,本书勾勒出1815年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画卷,全面评述欧洲秩序观的优劣,并对美欧秩序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制度优化和大国战略变迁尤其引人注目。

《大战胜利之后》首先总结国际秩序的类型,指出均势、霸权和宪

^⑩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p. 199—222.

^⑪ 门洪华:《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一项历史分析》,《远景基金会季刊》(台北)2006年第3期,第37—73页。